

改良 与 革命

——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 周锡瑞著 杨慎之译

中 华 书 局

改 良 与 革 命

——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 锡 瑞 著

杨 慎 之 译

中 华 书 局

1982 年 · 北京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76

改良与革命

——辛亥革命在两湖

〔美〕周锡瑞 著

杨慎之 译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⁵/₈ 印张·295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002 定价: 1.40元

中译本序

本书第一版于一九七一年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时，美国 an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既无外交关系，也没有文化交流。那时，我研究中国历史将近十年了。但是，我从未访问过中国，也不曾会晤过来自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学者——而我是热爱并且尊敬她的人民和历史的。同样地，在中国，由于“四人帮”的影响，很少学者曾经读到象我这样的研究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的作品。

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随着两国政府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中、美人民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正在稳步发展。去年，作为许多美国人中的一员，我幸运地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并有多次弥足珍贵的机会，和几所中国大学的史学家交换意见。现在，我深以为荣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杨慎之先生提供了我的著作的中译本。他是在医院治疗肺病中完成这部译作的。这一点，对我将是一个永志不忘的学习范例和有力鼓舞。我衷心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这个译本可能成为进一步学术交流的媒介。

虽然本书是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文化交流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读者们容易看出：无论如何，对于象我这样的学者，一种非常真实的学术影响是存在着的。把历史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在根本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寻找主要政治事件的根源的研究），这要大大归功于中国的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我和他们的结论悬殊，但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量知识。本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原始资料写作的，没有这些成果和资料，

这本书是难于问世的。如果说，我真正作出了某些贡献，那仅仅是：我竭尽绵薄，力图把这些资料 and 日本的以及英国的档案资料结合起来，以加深对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了解。在各国之间学术交流的新时代中，我希望，我们能使这些资料对于中外学者一样更加有用，使我们能够进行集体努力，共同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历史。

从本书在美国出版至今，五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都没有继续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本书肯定存在着有待纠正的错误。假如我现在能够重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我将进行一些轻微的改动。举例来说，我期望，对于革命党人和同盟会的贡献，现在有可能较原书略高地给以评价。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辛亥革命中的贡献，而是因为，革命运动在推动知识分子向着接受中国问题根本解决之途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推动他们朝着发动五四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前进的严重步骤。

当然，我仍旧坚持本书的基本观点：辛亥革命是由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所领导的。他们的纲领，只是使他们脱离疏远中国人民群众而已。其它学者各有所本，理当持有不同观点。但是，关于辛亥革命的全面理解，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回答：革命为什么发生，它又为什么失败？那个矛盾的复杂的一致性，是理解革命本质的关键，是许多分歧和争论的根源。如果我这本小书的译文，有助于学术争鸣，我将感到无比满足和高兴。对杨慎之先生，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诸位先生，对辛亥革命研究会和慨允为本书写出介绍文章的章开沅教授，对使本书译本得以出版的中华书局，我在此谨致真诚谢意。对于您们——亲爱的读者们，我表示热切期望：您们将批评和匡正我的错误，包括史实方面引证不够准确和阐释当中的偏颇舛谬。

周锡瑞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七日

由衷的高兴

周锡瑞先生《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的中译本出版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作者是六十年代末成长起来的美国历史学者的新一代，因此读者可以感觉到，在这本著作中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活力。他敢于摒弃以往美国某些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其中有些可以说就是陈旧的西方偏见），广事搜求档案文献资料，对两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进行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因而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象许多年轻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样，颇为流行的区域性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作者身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影响，那就是中国的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他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学术影响”。他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特别是比较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接。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贯串全书的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方法是：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个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使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

作者比较善于利用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他更致力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他利用了张朋园教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关于立宪派人社会背景方面的统计资料，对两湖议员身份作出相应的判断。但他并不囿于成说，同时又指出光凭议员的功名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背景，并且进一步对两湖

地区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的企业活动作了必要的考察。再如本书第四章,尽管所论述的新政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许多基本史事已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作者勤于思考,善于分析,也阐发了不少前人所未曾言及的新见。他既批评了以已故的芮玛丽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史学者在评论清末新政时忽略了人民群众,而本书在论述有关群众斗争时,又是如此艰苦地探索它们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即令是对于我国学者,也是可以作为借鉴的研究方法。

本书广泛地运用了大量英国的和日本的外交档案,特别是一些领事和情报人员关于两湖各地情况的报告,提供了不少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者对于有些重要历史事件(如长沙抢米风潮)分析论述得比较深入细致,多半得力于这些档案资料。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将可由此得到启发,今后应当在搜集和运用外国档案资料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距离作者将此书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整整已有十年的间隔。应该看到,十年以前的作者还很年轻,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了解难免有不足之处,对于有些中文资料的引用和解释也不尽确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此书在美国的正式出版,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但是,在本书中译本的翻译过程中,经过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已经作了不少力所能及的改进。慎之同志是一位勤奋谨严的学者,他的译文信实而又流畅,具有隽永的风格,这自然又为本书增色不少。

至于本书的一些学术观点,自然未必尽能为国内学者所同意,但至少可以起参考和启发的作用。中外学术交流,除了资料、方法等等以外,学术观点的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只要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应该受到必要的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有通过相互驳难,相互切磋,相互补益,才能逐步较其短长,分辨是非,最终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那种先入为主,深拒固闭,听不得

不同学术观点的武断专横,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作者至今仍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年来尤其注重实地考察和探索近代华北农村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可以继续增进作者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而且一定可以对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成果。在本书中译本即将正式出版之际,作者和译者都嘱咐我写点意见,我愉快地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且希望今后中外学术交流将有更大的进展。

章开沅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由衷的高兴·····	章开沅 1
中译本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改良败北的成果·····	11
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湖南的改良活动(14) 在日 本的谋叛(20) 秘密会党(23) 在上海煽动叛 乱(27) 一九〇〇年的起义(31)	
第二章 学生与暴动·····	38
帝国主义与湖南的开放(38) 教育改革和城市上流阶 层(46) 学生运动(52) 关于一九〇四年革命社 团的一个插叙(57)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学生运 动(60) 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起义(67)	
第三章 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	77
早期官府首倡的工业化(81) 收回利权和工业化 (83) 湖南的企业(89) 收回利权的企业的命运 (94) 收回铁路运动(97) 立宪运动(109) 城 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本质和成分(118)	
第四章 新政与群众·····	126
清末新政的本质和内容(128) 资助新政措施(134) 民众反对新政(139) 城市贫民(144) 一九一〇年 长沙抢米风潮(147) 风潮的余波(167)	
第五章 革命的来临·····	173

湖北军队不满的根源 (175)	湖北的革命团体 (181)	
革命的前夜(191)	革命政党的成熟(206)	
第六章 革命		214
武昌起义 (216)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220)	革命在
湖北的普及发展 (231)	湖南的革命 (239)	上流
阶层革命的动态(255)		
第七章 新政权		260
湖北: 政治上的内讧和右转 (261)	湖南: 开明政权	
(284)	辛亥革命与农村(298)	“革命”时代的终
结(301)		
跋		306
注释中使用的简写词		311
注释		313
引用书刊目录		380
译后记		389

绪 论

主权基础从家族世袭权利,转换到服从一国人民意愿的选择,这是近代历史上重大政治发展之一。西方世界的伟大革命,例如法国、美国和俄国的革命,都以推翻王权政府作为革命目标。中国也有一个把王朝转换为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这次革命,后来被意义远为重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弄得黯然失色了。但是,辛亥革命仅在意义上稍逊一筹。它本身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王朝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政治制度。从公元前二二一年起,君主官僚政权就一直统治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及其满洲家族,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但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短短几月之内,王朝变为民主共和,皇帝被总统取代,立法机构在北京召集会议,并且打算通过选举,在法律的基础上,明确地把政权从君权神授,转换成为取决于人民自由意愿的投票选举。

革命摧毁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所以,关于革命原因的研究,历史学家自然首先注意到反满革命和民主共和主义。受过西方教育的广东职业革命家、“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许多人之中,是最令人瞩目的。从孙中山出发,历史学家把注视的焦点,扩展到了革命阵营内其它知识分子和参与者,甚或及于象梁启超这样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对于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宣传倡导,鼓舞了在日本的一代学生。不过,这条研究线索,一定会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中国本身的事件,转移到在日本、东南亚和西方的那些流放者的出没之处。特别应当指出,

中国留日学生和流放者的自由报刊，已经为知识界的思想家提供了一种历史上的优越地位。

大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对于研究当代革命策略的有益观察。虽然，飘流在外的革命者能够利用革命形势，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诱发革命。任何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必须从该国的内部去寻找。值得庆幸的是，多数新近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内部的事情上面来了。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情：一九〇五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严重冲击力量（它结束了新成员进入上流阶层的传统基础）；从外国财团手中收回铁路和矿产权利运动以及运用中国资本发展现代经济的严重冲击力量；在全国建立有影响的省谘议局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宪政运动的严重冲击力量。新报刊、新学校、新军以及总称为“新政”的种种行政管理和宪政改良措施，正从制度设施上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这里的研究，是考察辛亥革命这些内在渊源、描述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的一次尝试。我一度相信，我能够把自己的探索向整个中国铺开，但是，那个念头一闪而逝，我终于参加了面向地方史的最近潮流的行列。这个抉择，大部分地取决于我对革命问题的直觉观点，当然，这是对历史运动的直觉观点。把一个历史时期的一定方面的因子离析出来，把自己的探索局限于一个或若干个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内：我发现那样做是有困难的。结果，这个论著探讨了教育改良，政治改良，发展经济，军事现代化，新闻业务，秘密会党，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反帝激情，革命预谋，以及人民暴动。所有对于总的革命环境产生影响的事物，我都进行了考察。虽然这些题目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单独进行研究，但是我相信，对于革命原动力的理解，要求我们考虑到它们的积累起来的重要性。不过，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在中国整个幅员的背景下考察每一个题

目,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为了论题的宽度,我也希望,为了在社会分析中的一定深度,而必须牺牲地域范围的宽度。

把注意力集中于湖南和湖北,是一个相对容易的抉择。革命在湖北爆发,并首先推向湖南。这些事实增加了革命在两湖地区的固有重要性和历史纪录。^{*}再有,以前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曾经提出合理的假说,即,宪政改良活动,收回铁路运动,新军和秘密会党,对于促使清王朝的最后覆灭,都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一点是重要的:选择一个这些运动和设施似乎都具有重要性并且文献纪录完整的地区。而湖南-湖北地区符合那个标准。最后,两湖地区——也许特别是湖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性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十九世纪时,湖南被看做中国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而在二十世纪,作为毛泽东和许多其它近代革命党人的家乡,湖南博得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声誉。

对于湖南和湖南人的政治声誉的这种改变,假如有着解释的话,其解释就植根于这个清末民初的时代。在一八九七年和一九一三年之间,保守主义和十九世纪对于地方民团的注意,变为改良主义和对于地方自治团体的关切。这种新的改良主义产生了种种革命潮流,某些潮流最后倾注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自己的实用主义及其地方根据地的革命战略,都似乎是湖南在这个时期流行的观念的派生物。甚至更加清楚的是,正是在这个期间,十九世纪的排外主义,变为二十世纪振振有词的、显著的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早期影响,虽然肯定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毛泽东的湖南出生地也许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增添了额外的重要意义。

^{*} 原注:在本书全卷中,“中国中部”是作为专指湖南和湖北的方便的名词来使用的。这里,它并不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一样,用来指称整个长江流域。或者说,我使用“中国中部”这个词,就是“两湖地区”的同义语。

在宁可选择两个省而不选择一个省作为重点的过程中，我在某些地方离开了分省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最近趋势。在这种场合，地区的结合和两省的内在关系保证了这种研究。从政治上说，两个省是亲密地联结在一起的：事实上，在明朝时期，它们就属于一个行政建制单位；清朝把这个地区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省，但是，在一个常驻武昌的湖广总督的管理下，把它们联结起来。到了清朝末年，从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除了短暂的离职以外，一个有名的政治家、“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一直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改良活动的成效之一，是使武昌成为两湖地区教育改良的中心，并且从湖南吸收了最优秀的学生。这就有利于为统一学生运动和两省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作出贡献。其结果，建立政权及其激烈的对手，在湖南和湖北以协调配合的方式进行活动。因此，它就使人把两个省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研究。

不仅在政治上和教育上，而且也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如果不是在几何学上的话），武汉三镇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三个城市各各具明显的特色，当时合起来大约有一百万人口。武昌是政治中心，是两省总督的任所，湖北巡抚的衙门也设在这里（直到这个职衔于一九〇一年取消时为止）。在中国，政治和教育有着亲密的联系，因此，武昌也是这个地区的教育中心和省绅集中的场所。武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样使它成为两湖新军部队大量集中的地方。横过长江就是汉口——它以座落于汉水入长江之口而命名。汉口是武汉地区的商业城市，从一八六一年起就是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是往返长江海洋轮船的经常终点码头，也是平汉铁路在南端的终点站，这条铁路是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分阶段通车的。轮船航运和铁路交通大大地提高了汉口的对外贸易，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间，对外贸易增加了三倍，据清朝海关报告，一九一〇年贸易总额达到了 135,299,167 两。⁽¹⁾ 汉口向来是中国本

身腹地省分贸易的主要货物集散地，由于这个原因，它就在事实上被选定为通商口岸。从湖北北部顺汉水而下，河南和陕西运来豆类、小麦、棉花和皮毛。顺长江而下，从四川和云南运来鸦片、茶叶和各种蔬菜及木本油类。从湖南，通过沅江和湘江一直注入浩瀚的洞庭湖，从那里顺长江而下，运来大米、煤炭、茶叶和木材。长期以来，所有这些贸易都集中于汉口，在现代，则从这里转拨到轮船，再输运分布到更远的地方。武汉三镇的最后一个城市是汉阳，它的工业建设使它成了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也是三镇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它拥有巨大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如果说，武汉是中国的芝加哥，那么，汉阳就是它的加里和印第安纳。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转折时期，湖南和湖北的人口曾被估算为五千万人左右，两省大约各占一半。实际上，这个人口中的多数，居住在从武汉溯江而上、象扇形般地展开着的长江中游平原。这片平地和低矮的丘陵地带，灌溉条件良好，适宜于栽培粮食作物，它向北沿着平汉铁路延伸粗估约七十英里，包括汉水流域的下游部分；溯长江而上，延伸到宜昌（长江峡谷从此开始）的四十英里以内，然后包括从湖南西北的常德至西南的长沙的广大地区。从这个富饶地区，特别是环绕洞庭湖的湖南地区，两省取得了经常可供出口的剩余谷物。

越过长江中部平原，山脉耸立在北部、西部和南部，而汉水、长江、沅水和湘江的水流又变得更加难驯莫测。不过，小汽艇、拖船和依靠桨篙推进的民船，都能在这些河流中通航，并且，长江的情况是，越过湖南和湖北的交界处，就变得更为方便。这些地区的人口，不及平原那样密集；但是，汉水流域上游是一片肥沃的盛产小麦的地区，而湖南的山区，则出产木材、茶叶、煤炭和矿藏，这些产品是通过汉口市场出口的。

会聚于武汉以上的这个河网地区，其最著名的地理政治也许

是：商业性的城市和政治性的城市，一般都是区别开来的。在长江上游，把沙市与湖南、湖北境内的长江平原西部联结起来的运河，使沙市在湖北的商业城市中仅仅次于汉口。但是，直到革命爆发时为止，从政治上来说，沙市都被附近的驻有大批旗人守卫部队的荆州府城弄得黯然失色。革命以后，宜昌这个通商口岸和州府城市，则成了湖北西部的政治中心。但是，用一个海关专员的话来说：“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相反，它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贸易。……”⁽²⁾它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仅仅是作为一个转运点而已：从四川和长江三峡以上地区用民船运载来的货物，在这里交由轮船转运，以完成在长江下游的一段里程。虽然宜昌最后在政治上较沙市更为重要，但它不能和沙市在商业方面的生命力相抗衡。在汉水流域，城市类型的相似的区别情况出现了：樊城和老河口是纯粹的商业城市，分别拥有七万五千和十万人口——是在汉口以上滨临汉水的最大城市。但是，它们甚至都不是县城，汉水上游的政治中心，是府城襄阳和安陆，这两个较小的城市在商业上毫无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长沙是湖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个城市有四个古老的著名书院，出色的理学家朱熹，一度在其中一所优秀书院讲学。尽管这些旧式书院被设置有西方课程的新学校弄得相形见绌，但是，这座城市仍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一九〇五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³⁾一九〇四年作为通商口岸被开放之前，在商业上，长沙尚不及控制湘江流域贸易的湘潭来得重要，也不及控制湘西、经由沅水的广西贸易的常德那样重要。一九〇二年，关于湖南城市在商业上的发展前途，岳州的海关专员发表了如下看法：

在湖南东部，将要考虑有发展前途的开放港口只有两个地方：长沙和湘潭。前者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她

大约拥有五十万人口。不过，她之所以显得重要，在于她是省会、又有许多官吏和富裕绅士居民这个事实。她本身是没有工业的，她的地理位置，也从未表明将要成为一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可是多年以前，湘潭就成为这样的中心了。……轮船传入中国以后，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汉口的定期航班，削弱了湘潭的重要性。从此，湘潭就开始衰落了。⁽⁴⁾

海关专员认为，常德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通商口岸。他把常德描述为：“一个繁华的地方，商店里堆满了外国货。”⁽⁵⁾长沙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巨大贸易中心的预测，最终证明是论据不足的。她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以后，在商业的重要性方面，就使其它城市为之逊色了。不过，在我们的故事的开头，我们就曾交代，象中国中部的其它地区一样，湖南的某些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文化中心，有些城市则从一开始就是商业中心。稍后，城市类型的这种区别意义深长，事情就变得明显了。因为，绅士权力倾向于在政治城市集中，而秘密会党则倾向于在商业中心荟集。

这就是我们将要考察辛亥革命的原因及其意义的地区。它是一片广大的地区，在其内部变化方面，与整个中国是类似的。它在汉口有巨大的、确立了了的、商业化的并且日益西方化的通商口岸。它有传统的文化中心，如长沙这样的“大学城市”，稍次一点的，还有湖南南部的衡阳。沿江河两岸，还有喧嚣热闹的、通常难于管理的城镇，流氓无产阶级成员惯于在这些地方组织秘密会党。此外，象湖南东部边界的浏阳、醴陵等县，成了秘密会党势力的中心。虽然我们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被吸引到武汉和长沙这样的城市政治活动上面，但是，对于我们的叙述的发展，所有这些城镇都将是重要的。

这儿的叙述，起自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湖南的改良活动，迄